



清代浙江进士群体研究

QINGDAI ZHEJIANGJINSHI
QUNTI YANJIU

多洛肯·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 of a landscape. It depicts a bridge over a body of water, with buildings and trees on the shore. The style is minimalist and artistic, typical of Chinese ink paint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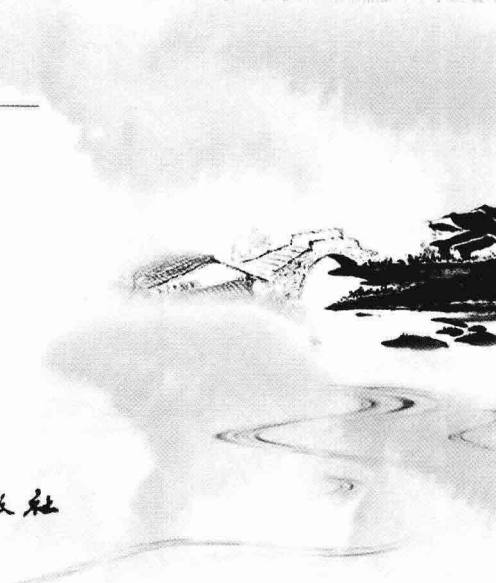


清代浙江进士群体研究

QINGDAI ZHEJIANGJINSHI
QUNTI YANJIU

多洛肯·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代浙江进士群体研究/多洛肯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 - 7 - 5004 - 8760 - 9

I. ①清… II. ①多… III. ①进士—研究—浙江省—清代
IV. ①D691.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0610 号

责任编辑 田 文
责任校对 张玉霞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4.5

插 页 2

字 数 401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目 录

导论	(1)
一 清代科举诸问题之研究回顾	(1)
二 研究史料与研究方法	(7)
三 清代科举制度述略	(20)
第一章 清代浙江进士特色论	(44)
第二章 清代浙江进士与传统教育	(117)
第一节 府州县学的发展	(118)
第二节 清代浙江小学(社学、义学和私塾)的重建与发展 ...	(123)
第三节 清代浙江书院的官学化述略	(130)
第三章 清代浙江进士与藏书刻书事业	(140)
第一节 清代浙江社会经济的发展概述	(140)
第二节 浙江籍进士藏书与刻书活动	(152)
第四章 清代浙江进士与文学	(170)
第一节 诗歌创作的兴盛	(170)
第二节 戏曲与散文创作成绩突出	(184)
第三节 文学理论批评成就斐然	(186)

2 清代浙江进士群体研究

第五章 清代浙江进士与史学、方志、文献学的兴盛 (193)

清代浙江进士名录与小传 (207)

第一节 清代浙江进士名录 (207)

第二节 清代科举文献中的浙江进士人物资料 (259)

主要参考文献 (377)

导 论

科举从隋唐迄清，在中国存在了 1300 多年。科举作为传统社会的“抡才大典”，发挥着传承、普及和弘扬以忠、孝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增强社会各界对国家政治参与的热情和能力，促进社会各阶层的流动，扩大专制统治的社会基础，维护和巩固专制政治和社会稳定等多方面的功能，传统中国官僚政治、士绅社会与儒家文化皆以科场为中心得以维系和共生，科场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和儒家经典教育的一个关键场所。以致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受到各界极大关注，成果迭出。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说：“中国的官吏是，或更正确地说，一开始就是类似于我们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一种以古代遗物来接受人文主义教育和考试的士……这一阶层由于它惯于在古人之后亦步亦趋，这已决定了中国的整个命运……”^① 由于科举考试直接影响到士人乃至国家命运，各朝封建政府为了能选拔合格的统治人才，实行严格的考试制度。

一 清代科举诸问题之研究回顾

1. 新中国成立以前研究状况

潘光旦在 20 世纪 30 年代所著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② 一书中，根据一些地主家族的家谱、地方志和 17 种科举硃卷，归纳出嘉兴的世家

^① 转引自张仲礼《中国绅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1 年版。

^② 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载《潘光旦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41—142 页。

平均是 8.3 代，也有长达 21 代的。以每代 26 年计算，通常一个家族的延续要达 200 年之久。以此来解释遗传，宣扬优生学。潘光旦和费孝通在 1947 年合作发表《科举与社会流动》，文章根据 915 本从清康熙至宣统一段时期中的硃墨卷，通过城乡比较、家世分析，推断出：“各种业务不同与居住区位不同的人口，在理论上谁都可以参加科举的考试，即法制并不限制，社会并无成见，已有功名之家对未有功名之家并不歧视；对凡有适当志愿者与力量的人，这一条路总是开着。”不过，“有资格读书应考借科举而上升的，大多限于地主阶级”。而一个依劳动力为生的人“读书的机会少，想靠文字的门径获取较高社会地位自是极不易的”。最后得出结论：“科举制度多少是以前社会流动的一条路，是当时所了解的人才所由觅上升或‘出头’的一个阶梯。”^① 陈东原的《中国科举时代之教育》^②，分六个章节概述了科举时代的科举、官学、私塾、书院、学风等情况。郭秉文的《中国近代教育制度沿革史》^③ 从管理制度的角度叙述了清代旧教育的发展历程和旧教育的过渡问题。1936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胡适等编的《张菊先生七十生日纪念文集》，该论文集收入谢国桢的《近代书院学校制度之研究》一文，分缘起、乾嘉以来书院建置之沿革、书院之课业及光绪间新旧学则之条议、吾人对今日教育之感想等四个部分对近代书院进行了深入研究，堪称清代书院研究的佼佼者。邓嗣禹在 20 世纪 30 年代出版了《中国考试制度史》一书，对中国古代的选举制度作了系统的叙述，其中对明清科举制度的异同也进行了分析，认为明清两代都很重视科举制度，但也有很大的差别。王亚南于 1947 年 12 月在《时与文》上发表的《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二大杠杆——科举制》（该文后来收录在稍后出版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第一次将科举制度放在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中进行考察。这一期间，对清代科举制度本身的介绍方面的论著有：周翰庭的《清代科举制度之次第》（《齐大学学报》1932 年第 1 期）、王楚材的《清代考试制度》（《西北

① 清华《社会科学》第 4 卷第 1 期，1947 年。

② 陈东原：《中国科举时代之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4 年 3 月版。

③ 郭秉文：《中国近代教育制度沿革史》，上海商务印书馆 1916 年 11 月初版，1922 年 2 月再版。

公论》1943年第10期)、魏斯逸的《南宫旧事》(《中和》1944年第9期)等。需要指出的是,此时期对科举制度的研究开始接触到科举人物的地理分布上,如章乃羹的《清代两浙科第表》(《文澜学报》1937年第3期)、陈湓的《清代瑞安选举人表》(《瓯风杂志》1933年第8—12期)、黄炎培的《清代各省人文统计之一斑》(《东方杂志》1931年)、王亚南的《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二大杠杆——科举制度》(《时与文》1947年第2卷第15期)等。

2. 新中国成立以后至80年代研究状况

据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清史论文索引》统计,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海内外学者发表有关清代科举专题论文约120篇。这些论文以民国时期和海外作者居多,内容集中在清代考试制度、考场、八股文、科名、状元、鼎甲、科场案诸方面。例如:韩国磐《略述科举制度》(《历史教学》1960年第4期),朱沛莲《清代之榜眼与探花》(《古今谈》1967年第25期),申明《记苏州彭氏的科甲》(1974年《春秋》第21卷第6期),侯建良《清代科举考试中的营私舞弊和严厉处分》(1981年7月20日《光明日报》)。这些论文多以介绍史实为主,深入研究明显不足。对清代科举制度介绍最为详尽的,当属商衍鎏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商衍鎏以亲身经历而又广征博引,述有清一代科举与学校制度,获有“通赡详明”之誉。王德昭的《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版)也对清代科举制度进行了分析,但其主要内容并不在于对清代科举制度的介绍上,而是主要集中在对清代存废科举制度争议的研究上,分析朝野各方对科举制度的态度及出发点。王德昭的《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与商衍鎏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属于两种迥然不同的研究方法,前者侧重于分析,取材较为广泛,而后者则偏重于介绍,取材限于政书。台湾学者刘光滨的《清代科举》(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77年版、1979年版)利用台湾故宫所存的、当时几件从未发表过的资料,对清代的科举制度再次进行了研究。从体例而言,与商衍鎏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很相似,亦根据清代科举考试的三级考试及种类进行,也对科场弊案进行探讨。1983—1993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朱有瓚主编的《中国近代学制史

料》，该书以学制变化为主线，辑录了自同治元年文馆成立到民国十一年（1922）壬戌学制公布 60 年间有关学校教育的谕令、奏章、咨文、通电及各地办学情况，取材范围既有一般文献，也有大量报纸杂志、地方志、文集、年鉴，特别是学部官报和地方教育官报，从而为研究地方新式学堂的发展带来了极大方便。王跃生《清代科举人口研究》（《人口研究》1989 年第 3 期）对清代科举人口的构成、数量、经济状况以及社会活动等进行研究。另有王跃生的《清代“生监”的人数剂量及社会构成》（《南开学报》1989 年第 1 期）、美国何炳棣《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62 年版）、林子勋《中国留学教育史》（1976）、朱保炯等《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3 年版）、王凯符《八股文概说》（中国和平出版社 1989 年版）等。

3.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研究状况

自 90 年代以来关于清代科举的研究论文，数量较前明显增多，而且质量有很大进步。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赵嘉善《明清科举与文字》（《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 年第 1 期），宋元强《清代科举与士子宿命论思想》（《求是学刊》1993 年第 4 期）、《徽商与清代状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3 年第 3 期），杨大业《明清回族进士考略》（《清史论丛》1994 年、1995 年），邸永君《清代的拔贡》（《清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吴仁安《明清庶吉士制度对比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97 年第 2 期）。吴建华分别撰写的《科举制度下进士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科举制下的社会功能》（《苏州大学学报》1994 年第 1 期、1995 年第 1 期），这两篇论文从社会学的视域分析了进士群体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政治功能与文化教育功能。有些论文从区域文化的视野出发，如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特色分析》（《南京大学学报》1997 年第 2 期），何炳棣《明清进士与东南人文》（《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会议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 年冬之卷）等。有关科举制度的著作，较以前大量增多，且内容绝大多数以叙述清朝为主。金净有关科举与传统中国文化关系的《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刘

虹《中国进士制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萧源锦《状元史话》(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宋元强《清朝的状元》(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邓云乡《清代八股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于景详《金榜题名——清代科举述要》(辽海出版社1997年版),陈茂同《中国历代选官制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李新达《中国科举制度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版),李双壁《入士之途——中外选官制度比较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郭齐家《中国古代考试制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王炳照、徐勇《中国科举制度史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邸永君《清代翰林院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邸永君《清代满蒙翰林群体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杨齐福《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李世愉《清代科举制度考辩》(沈阳出版社2005年版)等。杨学为等人《中国考试制度史资料选编》和杨齐福的《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两书分别从史料整理与理论探讨方面进行研究。陈剩勇在《清代社学与中国古代官办初等教育体制》^①一文中分析了清代社学、义学的特质、体制及规模。指出社学(义学)作为传统中国的官办初等学校,其教育宗旨、课程设置、日常管理、经费来源等均由朝廷管辖、督察和支持。邸永君《清代翰林院制度》一书,是至今为止研究清代翰林院最为系统的著作。他在书中指出:“研究明清科举制度者,多只囿于以往之定论,即秀才、举人、进士三级结构,以考中进士即认作是科举之路的终结;而研究教育制度者则从府、州、县学、八旗官学,一直国子监,即认为概括了所有的教育机构。”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把科举制度的研究,从三级考试上升为四级考试,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由进士馆选而庶常,庶常而留馆,加之清代特创之翰林大考,考差,无不是科举制度的延伸和发展。悄然于三级结构之上又多出一个层次——翰林。许友根《武举制度史略》(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是目前为止有关清代武举考试研究少有论著之一,虽然该书专门对清代的科举考试作了详尽的介绍,

^① 陈剩勇:《清代社学与中国古代官办初等教育体制》,《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

但是没有对其进行分析与论述。随着社会学与历史学的结合,也出现了一些用社会学方法分析科举制度的论著。如,张仲礼的《中国绅士》(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1年版)以其后续的《中国绅士的收入》(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1年版)是以乡绅研究为核心,同时也涉及了科举制度的研究。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解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以历代科举尤其是清代科举研究为基础,提出秦汉以后中国社会为“选举社会”的论点。张杰的《清代的科举家族》^①是用社会学方法研究清代科举制度较为成功的一个范例。该书以《清代硃卷集成》为基本史料,提出了“科举家族”这一概念,并指出:清代汉族主要官员基本上来自著名的科举家族。他认为科举家族是家族组织与科举制度相互作用的结果,他还列出了清代科举家族的判定标准,即:“世代聚族而居,凭借家族组织支持族人应试”、“从事举业人数众多,而且时代应举”、“至少取得举人或五贡以上功名的家族”。该书充分利用《清代硃卷集成》中数千份考生的硃卷履历,以翔实的史料,新的视角,从经济基础、人文环境、日常生活、社会流动、地域变化、家族影响的不同方面系统地研究将财富、学识、权力与名望结合在一起的清代科举大家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是目前利用《清代硃卷集成》进行家族研究的最系统、最深刻、最有创建的一部“极富学术创新的力作”。这一时期还有田启霖《八股文观止》(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启功等《说八股》(中华书局1994年版)、周腊生《清代状元奇谈——清代状元谱》(紫禁城出版社1994年版)、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等论著出版。

浙江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早在十万年前“建德人”开辟草莱,揭开了浙江历史的序幕。自宋代以来,浙江便被视为学术文化发达地区,以“人杰地灵”著称,至今不衰。关于浙江区域文化研究的成果,现知有杭州大学倪士毅教授的《浙江古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是书叙述了自十万年前的“建德人”至1840年以前的浙江

^① 张杰:《清代科举家族·戴逸先生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政治、文化发展概况,对清代浙江进士未有涉及。浙江社会科学院顾志兴研究员《浙江藏书家藏书楼》(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考察了自东汉王充开始的浙江历代藏书家与藏书楼的兴盛概况。藤复教授主编的《浙江文化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对浙江文化史展开专题研究,但也没有涉及进士方面的研究。20世纪末浙江省花费不少财力人力,编纂了《浙江教育志》等各类专志。笔者认为,《浙江教育志》的编纂不够理想,尤其是对浙江古代教育的论述语焉不详,甚至在材料的处理上也出现了不少硬伤。各部分章节水平参差不齐,加之校对不严,引文无范,书中舛误较多,学术价值大打折扣。笔者以为学术界对“清代浙江进士群体的研究”涉及的诸多问题,迄今只发表了一些浅析式的论文,而且引用的文献材料和数据也缺乏应有的考订辨析,对清代浙江进士这一特殊群体给予的关注,从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待进一步发掘。

二 研究史料与研究方法

1. 研究史料

史料是一切研究的基础,对史料的理解和辨析直接影响研究结果的合理与偏差。一般来讲,根据史料编写的组织形式,我们把史料分为六大类。

(1) 官修史书

《清实录》,是书中《满洲实录》、《太祖实录》、《太宗实录》、《世祖实录》、《圣祖实录》、《世宗实录》、《高宗实录》、《仁宗实录》、《宣宗实录》、《文宗实录》、《穆宗实录》、《德宗实录》均有大量的科举史料;《清史稿》之《选举志》之一、二、三、四分别记述了“学校上、学校下、文科、武科、制科、荐擢”方面的内容及其相关人物传记史料;《清国史》的传记史料及其《选举志》;《东华录》中的大量科举史料;《清史列传》之《儒林传》、《文苑传》等内容。

(2) 政书

《清朝文献通考》、《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续文献通考》、《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皇朝掌故汇编》、《大清律例》、《礼部则例》均涉及大量的科举文献材料;自乾隆六年开始编修历经嘉庆、道光、咸丰、

光绪四朝五次增删的《钦定科场条例》规定了科举考试方面的各种条文。

(3) 清代的各种档案材料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出版的《清代档案史料》亦有不少有价值的科举史料。

(4) 清代各种科举登科类文献

会试录，即会试后由主考官负责编纂的会试记录文献；登科录，由礼部负责编纂的殿试记录文献；同年序齿录，是进士个人按照年龄编纂的名录，有会试同年齿录和进士同年序齿录两类；进士履历便览，同年进士入仕后记录工作履历的记录；硃卷，由专人抄写的用于批阅与存档的科举考试试卷，也指士人自行刊刻的试卷，现有顾廷龙先生主编的《清代硃卷集成》（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可资利用。上述科举登科类文献资料除出版的外，笔者曾赴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普古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古籍部，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清华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北师大图书馆古籍部，上海图书馆古籍部，南京图书馆古籍部，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查阅馆藏的科举登科类文献资料，这是我们研究清代进士群体最直接、最详尽的资料，具体资料名目见第一章《浙江进士名录与小传》，兹不赘述。

(5) 地方文献

重点是省志、府志、县志。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现存浙江方志总数为373种。地方志中的学校志、选举志、人物志等都包含大量的科举文献与人物传记史料。这些也是我们研究浙江进士群体的基本依据之一。现将现存地方志的目录与版本情况胪列如下，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不仅有清代纂修的地方志，而且也包括民国时期编修的地方史乘。【康熙】浙江通志五十一卷首一卷（清康熙二十三年刻本），【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八十卷首三卷（清雍正十三年修乾隆元年刻本、嘉庆十七年校补刻本、光绪五年墨润堂校刻巾箱本、光绪二十五年浙江书局刻本、民国二十五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清光绪本），【民国】重修浙江通志初稿（稿本、民国三十七年铅印本），【康熙】杭州府志四十卷图一卷（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清康熙三十三年李铎增刻本）、杭州三诒三误辨一卷（清康熙间《西河合集》本）、【乾隆】杭州府志一百一十卷首六卷

(清乾隆四十四年修、四十九年刻本),【光绪】杭州府志稿二百二十卷(光绪二十四年修稿本),【民国】新纂杭州府志稿一百七十八卷(民国五年修稿本),【民国】杭州府志一百七十八卷首八卷(清光绪二十四年修、民国五年续修、民国十一年铅印本、民国十四年缩印本),【康熙】钱塘县志三十六卷首一卷(清康熙五十七年刻本、清抄本),【嘉庆】钱塘县志补不分卷(清嘉庆间纂、清抄本),【康熙】仁和县志二十八卷(清康熙二十六年刻本、抄本),【光绪】仁和县志稿不分卷(清光绪二十九年纂、稿本),【康熙】余杭县志十卷(清康熙四年刻本),【康熙】余杭县志八卷(清康熙十二年刻本、清康熙二十四年重印本),【康熙】余杭县新志八卷(清康熙二十四年刻本),【嘉庆】余杭县志四十卷(清嘉庆十年修稿本、清光绪六年王崧辰活字本、民国八年吴兰孙铅印本),【光绪】余杭县志稿不分卷(光绪三十二年刻本),【康熙】富阳县志十二卷(清康熙十二年刻本),【康熙】富阳县志十卷(清康熙二十二年刻本、抄本),富阳志备采三十二卷(稿本),【光绪】富阳县志二十四卷首一卷(清光绪二十五年修、三十二年刻本),【康熙】临安县志十卷(清康熙十四年刻本、抄本、传抄清雍正元年增刻本),【乾隆】临安县志四卷(清乾隆二十四年刻本、清光绪十一年活字本),【宣统】临安县志八卷首一卷末一卷(清宣统二年活字本)、临安县志补八卷余六卷志纠四卷(稿本),【康熙】於潜县志八卷(清康熙十二年刻本、乾隆三十一年刻本),【嘉庆】於潜县志十六卷首一卷末一卷(清嘉庆十七年活字本、抄本),【光绪】於潜县志二十卷首一卷(清光绪二十四年修、民国二年谢青翰石印本),【康熙】昌化县志十卷(清康熙十二年刻本),【康熙】昌化县志十卷(清康熙二十二年修、抄本),【乾隆】昌化县志二十卷(清乾隆十三年刻本),【道光】昌化县志二十卷(清道光三年刻本、清抄本、抄本),【民国】昌化县志十八卷首一卷(民国八年修、十三年铅印本、抄本),【乾隆】严州府志三十五卷首一卷(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光绪】严州府志三十八卷首一卷(清光绪九年增刻本),【康熙】建德县志九卷首一卷(清康熙二十三年刻本),【乾隆】建德县志十卷首一卷(清乾隆十九年刻本),【道光】建德县志二十一卷首一卷(清道光八年刻本),【光绪】建德县志二十一卷首一卷(清光绪十八年刻本),【民国】建德县志十五卷首一卷

附录二卷(民国八年金华集成堂铅印本),【康熙】新修寿昌县志十二卷(清康熙二十二年刻本),【乾隆】寿昌县志十二卷(清乾隆时九年刻本),【光绪】寿昌县志十一卷(清光绪二十八年修、抄本),【民国】寿昌县志十卷首一卷(民国九年金华大同印务局铅印本),【顺治】新修淳安县志六卷(清顺治十五年刻本),【康熙】淳安县之二十卷(清康熙二十二年刻本),【乾隆】淳安县志十六卷首一卷(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光绪】淳安县志十六卷首一卷(清光绪十年刻本),【康熙】遂安县志十卷(清康熙十二年刻本),【康熙】遂安县志十卷首一卷(清康熙二十四年刻本),【康熙】遂安县志十卷(清康熙五十四年刻本),【乾隆】遂安县志十卷(清乾隆十八年刻本),【乾隆】遂安县志十卷首一卷(清乾隆三十二年刻本、清光绪十六年唐济活字本、民国十七年活字本),【民国】遂安县志十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十九年铅印本),【康熙】桐庐县志四卷(清康熙十二年刻本、二十年增刻本、抄本),【康熙】桐庐县志四卷(清康熙二十二年刻本、抄本),【乾隆】桐庐县志十六卷(清乾隆十八年修、二十一年刻本、清乾隆间抄本),【康熙】分水县志六卷(清康熙二十二年刻本、抄本),【道光】分水县志十卷首一卷末一卷(清道光二十五年刻本),【光绪】分水县志十卷首一卷末一卷(清光绪三十二年刻本、民国三十年重印本),【民国】续修分水县志十四卷首一卷(民国三十一年铅印本),【康熙】新城县志八卷首一卷(清康熙十二年刻本、民国二十二年抄本),【道光】新城县志二十卷首一卷(清道光三年深清堂刻本),【民国】新城县志二十卷首一卷(民国八年修、十一年铅印本),【康熙】萧山县志二十一卷(清康熙十二年刻本),萧山县志刊误三卷(清康熙间《西河合集》本),【康熙】萧山县志二十一卷(清康熙三十二年刻本),【乾隆】萧山县志四十卷(乾隆时六年刻本、抄本),【民国】萧山县志稿三十三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民国】萧山县志稿十四卷志余一卷(民国三十七年纂、稿本),【康熙】嘉庆府志十八卷首一卷末一卷(清康熙二十一年刻本),【康熙】嘉庆府志十六卷(清康熙六十年刻本),【嘉庆】嘉兴府志八十卷首三卷(清嘉庆六年刻本),【道光】嘉兴府志六十卷首三卷(清道光二十年刻本),【光绪】嘉兴府志八十八卷首二卷(清光绪四年鸳湖书院刻本),【嘉庆】嘉兴县志三十六卷首二

卷(清嘉庆六年刻本),【光绪】嘉兴县志三十七卷首二卷末一卷(清光绪三十四年刻本),【民国】嘉兴新志上编(民国十八年嘉兴建设委员会铅印本),【康熙】秀水县志十卷(清康熙二十四年刻本),【民国】重修秀水县志稿不分卷(民国九年修、稿本),【顺治】嘉善县纂修启榷条款四卷(清顺治七年刻本、民国抄本),【康熙】重修嘉善县志十二卷(清康熙十六年刻本),【康熙】续修嘉善县志八卷(清康熙二十三年刻本、抄本),【雍正】续修嘉善县志十二卷(清雍正十二年刻本),【嘉庆】重修嘉善县志二十卷首一卷(嘉庆五年刻本),【光绪】重修嘉善县志三十六卷首一卷(清光绪二十年刻本),【康熙】平湖县志十卷(清康熙二十八年刻本、民国平湖陆氏求是斋抄本),【乾隆】平湖县志十卷(乾隆十年刻本),【乾隆】平湖县志二十卷首一卷(清乾隆四十五年刻本、平湖陆氏求是斋抄本),【乾隆】平湖县志十卷首一卷末一卷(清乾隆五十五年刻本),【嘉庆】平湖县续志十卷附旧志补遗四卷(清嘉庆十一年刻本、民国晒印本、平湖陆氏求是斋抄本),【光绪】平湖县志二十五卷首一卷末一卷(清光绪十一年修、稿本、清光绪十二年刻本),【民国】平湖县续志十二卷(民国十五年修抄本、平湖葛氏传朴堂抄本),【康熙】海盐县志十卷(清康熙间修、稿本、抄本),【康熙】海盐县志补遗(清康熙十二年抄本),【乾隆】海盐县续图经七卷(清乾隆十三年刻本),【光绪】海盐县志二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清光绪二年修、稿本、清光绪三年蔚文书院刻本),【顺治】海宁县志略不分卷(顺治十三年修、稿本、清管庭芬抄本、清光绪八年《清风室丛刊》本、抄本),【康熙】海宁县志十三卷图一卷(清康熙十四年修、二十二年续修刻本),【乾隆】海宁县志十二卷首一卷(清乾隆二十三年修、三十年续修刻本、清抄本),【乾隆】海宁州志十六卷首一卷(清乾隆四十一年刻本、清道光二十八年朱绪曾补刻本、民国抄本),【民国】海宁州志稿四十一卷首一卷末一卷(光绪二十二年修、民国十一年续修铅印本),【康熙】桐乡县志五卷(清康熙十七年刻本),【嘉庆】桐乡县志十二卷(清嘉庆四年刻本),【光绪】桐乡县志稿(清光绪四年稿本),【光绪】桐乡县志二十四卷首四卷(清光绪十三年刻本),【康熙】石门县志十二卷(清康熙十二年修、十六年续修刻本、清康熙四十七年增刻本),【嘉庆】石门县志二十六卷首一卷(清嘉庆二

十三年修、道光元年刻本),【光绪】石门县志十一卷一卷(光绪五年刻本),【顺治】湖州府志前编十二卷(顺治六年刻本),【乾隆】湖州府志五十卷首一卷末一卷(乾隆四年刻本),【乾隆】湖州府志四十八卷首一卷(清乾隆二十三年刻本),【同治】湖州府志九十六卷首一卷(清同治九年修、十三年爱山书院刻本),【康熙】乌程县志十二卷(清康熙二十年刻本),【乾隆】乌程县志十六卷(乾隆十一年刻本),【光绪】乌程县志三十六卷(清光绪五年修、稿本、光绪七年刻本),【康熙】归安县志十卷(清康熙十二年刻本),【光绪】归安县志五十二卷首一卷(清光绪八年刻本、清同治、光绪间刻《潜园总集》本),【顺治】长兴县志十卷补遗一卷(顺治六年驯雉堂刻本),【康熙】长兴县志八卷(清康熙十二年刻本、抄本),【乾隆】长兴县志十二卷首一卷(清乾隆十四年刻本),【嘉庆】长兴县志二十八卷首一卷(清嘉庆十年刻本、抄本),【同治】长兴县志三十三卷(清同治十二年修、光绪元年刻本、清光绪十八年邵同珩孙德祖增补重校刻本),【康熙】安吉州志十卷(清康熙十年刻本、抄本),【乾隆】安吉州志十六卷首一卷(清乾隆十五年刻本),【同治】安吉县志十八卷首一卷(清同治十三年刻本),【康熙】孝丰县志十卷(清康熙十二年刻本),【同治】孝丰县志十卷首一卷(清同治十三年修、光绪五年刻本、清光绪二十九年补刻本),【康熙】德清县志十卷(清康熙十九年刻本、民国六年德清县续修县志事务所石印本、抄本),【嘉庆】德清县续志十卷(清嘉庆十三年修、稿本、清嘉庆十三年刻本、民国六年石印本),【民国】德清县新志十四卷(民国十二年修、二十一年铅印本),【康熙】武康县志八卷(清康熙十一年刻本、清抄本、民国抄本),【乾隆】武康县志八卷(清乾隆十二年刻本、清乾隆四十四年刻本、抄本),【道光】武康县志二十四卷首一卷(清道光九年刻本、民国抄本),【康熙】宁波府志三十六卷首一卷(清雍正十一年刻本、清乾隆六年色超补刻本、清道光二十六年刻本),【康熙】鄞县志二十四卷首一卷(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康熙抄本),【乾隆】鄞县志三十卷首一卷(清乾隆五十三年刻本),【乾隆】鄞县志稿二十卷[清乾隆间纂、稿本、民国二十四年刻《四明丛书》(第三集)刻本],【咸丰】鄞县志三十二卷首一卷(清咸丰六年刻本),【同治】鄞县志七十五卷(清同治十三年修、稿本、清光绪